考古人類學刊・第 80 期・頁 221-250・2014
DOI:10.6152/jaa.2014.06.0007

族群展示的反思：後威權臺灣的觀察*

李 威 宜**

摘 要

在臺灣自威權時代向民主化轉變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博物館出現的族群熱現象及其隱憂。本文首先回顧臺灣人類學已出現的諸多反省，從尊重土著觀點到發聲政治、社區賦權、文化權的支持等，思維視野已帶到了新的至高點，但問題卻持續存在。我們繼而檢視臺灣威權慣習制約下的社會條件與歷史遺留，並通過「文化再現」與「展覽規訓」兩個層次的討論，展開對同一性政治的批判。最後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出我們對博物館「人／群」新定位的幾點看法。

關鍵字：文化再現、同一性、展覽規訓、公共表達、異質共生

* 本文書寫契機始於 2011 年 6 月參加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舉辦的「把人類學家帶進來：公共人類學工作坊」，呂欣怡教授的邀請，引發筆者思考人類學在博物館場域公共參與和社會實踐課題。會議中評論人李子寧先生的建議和期許，之後與眾多跨領域學者一段漫長來回提問反思答辯的書寫過程，以及本文幾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與具體建議，才有這份文本的呈現，特此致謝。惟文中任何缺失，由筆者自負文責。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wilee@mx.nthu.edu.tw。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0 : 221-250 • 2014

Reflections on the Exhibition of Ethnicity : Observations from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Wei-i Lee*

ABSTRACT

Dealing with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of ethnic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som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is subject, namely respect for indigenous points of view, politics of voi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defense of cultural rights. But despite the high level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problems still exist. We think that it's necessary to reassess the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traditionalist paradigm inherited from the authoritarian era, and to carry out a critique of identity politics through a focus on two aspec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exhibitionary discipline. Finally, we propose some ideas,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a repositioning of the concept of "human/population" in museums.

Keyword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exhibitionary discipline, public expression,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wilee@mx.nthu.edu.tw

博物館的族群熱及其隱憂

近二十年來，臺灣因為後威權政治與社會條件的改變，族群現象的顯題化，在博物館場域出現眾多與族群議題相關的常設展和特展的熱絡情形。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中國廳、南島家屋、大洋洲廳、臺灣原住民、惠來人、苗族、西拉雅族等展覽；[1] 國立臺灣博物館有關南島語族族群分類的常設展，以及平埔族、排灣族、賽德克族等各項族群特展；[2] 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關於族群遺址、臺灣史前史的民族考古學與當代原住民議題的各項展覽；國立歷史博物館一系列古文明特展，例如馬雅、印度、剛果等；[3] 順益博物館一系列與卑南族、鄒族、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賽夏族社區團體合作的展覽；以及新開幕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一系列關於原住民、平埔、眷村等各種族群樣貌特展。[4] 不勝枚舉的展示活動，讓族群概念變成媒體與公眾注目的焦點。

21 世紀以來，因應多元族群認同的國家主張，臺灣政府亦將原住民意像，製作成臺灣認同的重要標誌，運用在新的外交再現政策中。例如，2002 年巴黎的臺灣文化中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舉辦《海洋之子—臺灣達悟族文物展》，展出臺灣東南外島的海洋文化；2003 年又以島嶼原住民文化為題策劃《眾神的故事—臺灣原住民神靈意象與神話》，展出六十多件原住民族的宗教儀式文物。

事實上，族群議題是解嚴後認同運動中興起的各地方博物館的執著所在。例如 1993 年宜蘭縣史館開幕，作為臺灣第一座「反對黨」主政建設的地方史官方博物館，旨在呈現與中央政府核准的大中國歷史敘事斷裂的族群論述（以漢人／閩南主體為中心，因此稱作 197 年開蘭紀念）。1990 年代快速發展的原住民認同運動與客家認同運動，以及之後在中央部會取得的官方代理機構，1996 年成立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2001 年客家事務委員會，一種多元社群身份認同結構，不僅在政治上被制度化，在博物館場域更形成相當規模的文化再現熱：相繼出現數十座原住民文物館、客家館與客家文化園區，[5] 並在近年來文化創意政策的驅動下，繼續增生繁衍。

島嶼多元族群認同現象，在博物館系統中，可謂蔚為壯觀。然而，這百花齊放的欣欣景象，會不會只是進入後威權時代，能量瞬時釋放之下的曇花一現呢？這的確是博物館後續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1990 年代以來形成的族群博物館建設熱潮，很快便碰到了瓶頸。原住民館與地方文化館的發展，往往與選舉政治的動員需求相連結。博物館原應作為一個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性公共制度，卻被理解成一個代表文化權威的身份認同場域。這使得在實際打造族群博物館的過程中，往往將有限的資源挹注在政績色彩明顯的土木工程硬體建設上，而需要大量資源的文物內容卻往往只是擺上幾個圖片說明看板，再掛上具有象徵意義的博物館招牌，舉行開幕典禮拍照宣傳便完工結案，因此淪為專家、媒體與民眾戲稱的「蚊子館」。儼然一片海市蜃樓（姚瑞中 2011）。由於不願切實投入一座完善的博物館所需要之研究、典藏、文獻、展示等一系列複雜的人文工程，自然無法實踐現代博物館機制的設計理念，引導出適切的文化交流。因此，儘管數十年間官方已經耗費不少經費，仍然無法有效達成原住民與地方社群文化資源共享的理念。

近年來客家文化園區大量設立，其方式也是沿著族群切割線來爭取國家文化資源補助。當然，這是基於改變過去閩客之間不對等權力關係的權益爭取結果，構成一個絕佳的民主契機，原有可能建設一種新時代客家文化再創造的場域。然而在以經濟利益導向為優先原則的操作下，實際建設過程卻是亦步亦趨，一味強調與觀光市場機制的緊密連接。雖然也提出運用文化創意的新觀念，企圖創造一種新的文化格局，但是囿於形式主義的符號運用，反而加速了客家文化被商品化與象徵化的雙重褪化。商品化導向的建設，將有限資源耗在一座座裝飾族群風情的休閒公園建設上，當然不能解決客家族群普通市民、勞工、農民等，在複雜流動的當代社會中被解離失所的文化匱乏困境，也無法改善族群內部文化不平等的事實。而流於形式的象徵化操作，則讓客裔社群的文化實踐，往往繼續回復過去宗教與宗族的歷史場域，複製封閉的傳統主義結構，而這顯然不符合當代生活型態對族群文化交流開放的需求。

對於博物館族群熱的隱憂，該如何面對？能如何思考？由於人類學這門學科以研究種族、民族、族群等問題起家，並長期捲入博物館族群展示的相關工作，因此後威權時代的臺灣，已經出現不少對族群展示問題反省的論述與實踐。

人類學對族群展示的反省

人類學家進入田野，以「民族」為論述對象生產知識，是人類學基本的學科定位。無論是 Malinowski 創建的人類學田野典範，或是進入臺灣的第一批探險人類學家森丑之助、鳥居龍藏與伊能嘉矩的田野調查，第二批臺北帝國大學場域的學院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等（移川子之藏等 2005），都以科學標準，追求民族知識的客觀性。這一科學典範，構成了現代科學博物館展示人類文明的操作原則，或就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域叢結或就物質文化，以民族分類的手法，創造出一種具有本質性與原真性的「展示客體」。不過，人類學早期這種以傳統主義製作他者本質的作法，在二十世紀中期已經多有反省。1980 年代以來隨著人類學理論範式在認識論上的革命，新民族誌、反省人類學、實踐人類學等不同進路的拓展（Clifford 1988；Marcus and Fischer 1986；Ortner 1984），更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原本結構功能觀的族群本質內容，逐漸轉入流動跨界的文化想像與族群景觀（Appadurai 1996）、文化展演的社會實踐（胡台麗 2003），特別是博物館人類學的反省（Dias2001；Jones 1993；Kaplan1996；Shelton2006）。這意味著人類學對於研究對象的定位，必需從客體轉為主體。

「土著」觀點

解嚴以來，臺灣各人類學機構紛紛重啟對博物館機制的使用。先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 1988 年將原「凌純聲先生紀念標本室」改制為「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陸續完成「臺灣土著民族」、「中國大陸邊疆民族」兩個常設展示，以及「臺灣漢人民間宗教」、「太平洋地區民族學標本收藏展」兩個專題展示（呂理政 1988）。然後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室於 1995 年為紀念該系創系人李濟百年誕辰，與文建會規劃「臺灣史前文化」與「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專題展，離該系上次特展已有四十餘年（胡家瑜 1996）。[6] 受到西方人類學理論範式的影響，後威權時代臺灣人類學的博物館實踐，開始出現對展示客體問題的反省。1995 年臺大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在協助該系舉辦紀念創系人李濟百年誕辰特展後，就曾談到博物館事業中異文化詮釋的難題：

> 「本次『臺灣史前文化與原住民物質文化特展』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在詮釋觀點中平衡呈現『土著』的觀點。這個尖銳敏感的問題，是所有異文化展示不願觸及但又難以迴避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政治議題的發展，呈現『土著』內部觀點與文化資產權利的歸屬問題，成為熱門的爭論議題。」（胡家瑜 1996：60）

「土著」觀點的定位與展示，是人類學實踐的一個曖昧之處。傳統人類學的權威，建立在對異族文化的知識生產上，因此儘管早就建立了傾聽「土著」觀點的學科方法，但其問題意識仍舊關注在人類學知識系譜的發展命題；「土著」觀點只是為了民族誌深描的有效性與客觀性，成就的是知識客體的精確科學性，而不是讓研究對象成為知識主體。因此儘管有了尊重「土著」觀點的基本精神，但仍是以人類學觀點為中心的。而後殖民思潮典範影響下的知識轉型，迫使作為知識權威的人類學家，開始反思自己學科

臺灣本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動中的權力關係。

發聲政治

尊重「土著」觀點，對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與方法論來說，早已是共識，但真要在博物館場域上實踐，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理想。因為這意味著兩個層級的觀念轉換：第一個層級在於發聲者的社會身份，不再由人類學家包辦知識生產，而是要讓「土著」觀點得到有效表達，開放原住民自主參與；第二個層級則是發聲者的主體意識，並非由原住民發聲就保證了族群的主體性（原住民也可能再生產主流論述），而異族人類學家的參與，也未必就會抹殺族群的主體性。主體性在文化民主的機制中，首先是一個在社會意識上實現自主性，而非任何身份界定的問題，其內容要求的是一定的政治關係，首先便是話語權的保障，即所謂的發聲政治。

對於博物館活動中的發聲政治，人類學者許功明有著長期實踐、研究與反省。她在 1990 年代末，就率先檢討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灣南島民族展示的問題，指出該展示仍為複製原住民與主流漢人社會之間不平等關係的結果，從大多數原住民觀眾的觀點來看，那樣的展示呈現出來的只是他們的過去式，卻被美其名為文化傳統的展示，與其當代生活樣貌和生態環境呈現極大落差（許功明 1997, 1998）。之後許功明深化對發聲主體問題的研究，觀察到臺灣從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博物館策展中原住民主體位置，雖已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卻依然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在對幾個策展個案的分析中，[7] 她提出：

> 「當代原住民文化展示之策展行動，可被歸類為一種『反抗式』的社會實踐過程，因為其顛覆主流價值的作法，強調反『客體』為『主體』，藉著博物館文化機構之展示發聲與展演運作來達成。然究其實，我們以為『第四世界』的聲音、發聲權及反抗力量，並非得由該族群本身所獨享，聲援者也不一定要是來自第四世界（如上述史前館的『照片會說話』展示），更不是說要用一種新的話語霸權來取代或抗衡優勢者。因為後殖民的話語是要取消中心以達多元共生、互滲與共生關係，讓知識份子從二元對立走出，進到多元的後現代格局。」（許功明 2004：275）

由此可見，臺灣博物館場域的族群展示，經過了 1990 年代民主政治的衝擊與知識範式的轉型，已經轉變成一個願意提供原住民發聲的場域。而研究者，如許功明，則更進一步提出了取消中心以達成多元共生的後現代願景。然而，實際運作並未發生根本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轉變，仍然像許功明所指出的一樣，縈繞在一種反抗式的社會實踐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發聲政治作為理念被視為新的範式，其實內容上還沒有得到更細緻深入的探討：不僅是誰發聲的問題？還包括在哪裡發聲？目的為何？發聲訴求對象為誰？現實的博物館建設中，如何從政治中心的主流位置，重返政治邊陲的地方社會，進行社區賦權？這是人類學反省族群展示問題，另一個更困難的實踐目標。

社區賦權

社區賦權這個時代性的新課題，的確讓當代人類學的博物館實踐，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不過，我們的觀察注意到，已經出現了博物館人類學家推動社區賦權的可能。近年來國立史前文化館的藍海策略，強調提供原住民社區一個自我展現與詮釋文化的空間（臧振華 2005），各大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等）推動的「大館帶小館」活動，都是一些重要案例（林頌恩 2011；馬田 2012；廖珮珊 2011）。我們以國立臺灣博物館「文物回娘家」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館「部落策展人」個案，略作說明。

2007 年原民會發起原住民文化館活化計畫「大館帶小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2009），企圖利用大型國立博物館的典藏資源，帶動俗稱「蚊子館」的地方博物館或族群博物館的生機。第一個個案，是 2009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兩間原住民文物館（花蓮縣瑞穗鄉的奇美文物館、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生活館）合作展開的「文物回娘家」系列活動，讓部落代表進入臺博館庫房接觸文物、選擇文物、借回文物，並由部落自行組織力量（年齡組織或部落長老會議）參與展覽，透過圍繞文物的展示名牌、導覽解說等知識生產，相關儀式展演的重建，集體從事部落歷史記憶的重組與社會再造的活動（廖珮珊 2011）。第二個個案，是 2008 年國立臺灣史前文化館與兩間原住民文物館合作舉辦的特展（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合作所推動「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遺忘的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kasuan）之戰」特展），在大館帶小館的資源挹注下，一改過去模仿再現導致自我「異文化」的觀看手法，在史前館執行者特別關注博物館的社會責任與部落文化發展的關係（林頌恩 2011），著重部落耆老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故事，探索族人對於歷史事件的記憶，並從中摸索博物館與駐館員之間最佳互動的位置關係，持續進行部落策展人的培力實踐（馬田 2012）。

這一過程中，博物館場域的人類學者不再是原住民物件的策展人或物質文化權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發言人，而是尋求社區賦權的物件管理者與資源交流者，為權力轉化與知識生產創造在地條件（李莎莉 2007）。而且幾位國立博物館的行動者，不僅通過這一活動實踐自己的人類學理念，更有意識地反思學科的社會實踐。例如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李子寧（2009）便曾撰文，說明自己如何借鑑北美博物館與印地安人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接觸區的論述（Clifford 1997），將它發揮到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奇美文物館合作的行動準則中，並且進一步提出了對策展過程的反思。

「大館帶小館」方案，無論是文物回娘家的嘗試，還是部落策展人的實驗，都是博物館讓社區賦權的一種實踐。其之所以可能，我們認為有兩個重要因素：第一當然是文化民主化與原住民自治雙重力量所交織的社會大局勢，二則是參與這一實踐的行動者自身的社會意識。然而，一旦涉及社區賦權，必然會帶動對於文物歸還的反省。相關行動者的另一篇文章（李子寧 2005）〈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百年來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已經點出他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近年來，圍繞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館藏「國寶」文物—太巴塱部落祖屋雕繪木柱—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更為文物歸還的人類學反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考案例。

文物歸還

阿美族太巴塱 Kakita'an 祖屋其實很早便引起了人類學家的關注，在 1935 年臺灣總督府委請臺北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進行的史蹟調查中，就已被列為史蹟。1958 年大颱風中祖屋倒塌，僅有以圖紋講述部落許多重要神奇傳說的雕繪木柱，經人類學者任先民與劉斌雄搶救，文物帶回中央研究院標本室保存典藏。2003 年太巴塱部落年輕人造訪民族所博物館，與館方交涉希望歸還。經館方與部落反覆協商，以文物能夠獲得完善保存為原則，啟動部落迎回祖靈方案。2004 年 Kakita'an 家族和村落代表，透過女巫師的媒介，在民族所博物館現場與柱中祖靈接觸對話，完成請靈儀式，返鄉開展祖屋重建，民族所還贊助經費複製雕繪木柱。之後的重建過程中，又因為發生部落內部宗教關係、土地產權等複雜爭議，而一度受阻，直到 2007 年重建祖屋提報花蓮縣政府列為「文化景觀」，始得留存。這一系列事件，臺灣影像人類學的重要學者胡台麗做了長期的跟蹤拍攝（2003-2010），後來更製作發表了題為《讓靈魂回家》的人類學紀錄影片（胡台麗 2012b）。2011 年中華民國百週年慶祝，民族所博物館留藏的七件太巴塱木雕，經館方推動，獲文建會審核登錄為文化資產法保護級「國寶」。

這一案例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其中匯集了人類學與博物館在當前臺灣互動實境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有要素的反省：從傳統文化遺產的繼承、保護、展示，到新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下對歷史遺留問題公正處理的各種訴求，從學術研究的深化與活化實踐，到部落文化生活的社會重組等等，其中存在的豐富潛能與現實條件的客觀限制交織纏結，充分體現了問題的複雜性。儘管文物最終仍未歸還，但至少學術機構與部落居民在棘手的文化財爭議中，謹慎處理部落多種位置的代表性問題（傳統神聖家族代表、社區委員代表、部落代表、地方政治人物代表等），並經由反覆協商過程，藉著有形與無形的分殊轉譯，暫時取得了多方可以接受的處置方式：博物館實現了符合科學知識要求的「典藏文物」保護，部落透過薩滿儀式帶回祖靈的「無形文化遺產」，在部落重建祖屋，塑造了新的文化表達空間。

胡台麗在〈我為什麼要攝製「讓靈魂回家」紀錄片？〉所做的說明，透露出她對博物館文物多重意義可能的反省：

> 「民族所的收藏有無正當性？這部影片除呈現民族所的觀點，還努力凸顯部落人的感受。對收藏單位來說，這些雕繪木柱只是登錄和展示的文物，但是太巴塱部落人，尤其是透過巫師溝通後看到、感知到的卻是在木柱中有喜怒哀樂情感的祖靈。」（胡台麗 2012a）

所以不同脈絡、不同的視角之下，雕繪木柱獲得的不同意義，構成了一個文化事件寶貴的豐富性，也恰是社會自身多元性的內涵所在，需要通過新的文化交流去發掘深化。臺灣當代人類學者對於原住民文物的展示問題的反省，已經對研究機構展示物件的科學性與原真性，以及原住民文物在部落社會的社會性與神聖性，開啟深刻對話與多元表達的可能。

在人類學放棄族群代言的權威後：突破認同式意識型態的必要

受到後殖民論述的影響，臺灣人類學對於族群展示的反省，已經將博物館的族群對象，從展示客體轉設為展示主體，嘗試讓「土著」發聲，希望突破反抗式的社會實踐，努力為社區賦權，並在棘手的文物歸還與文化財的爭議上，找出有形遺產與無形遺產的分殊與轉譯處理方式，人類學的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已將思維視野帶到了新的至高點。

然而，為何當前博物館族群熱的蚊子館與商品化的問題，卻似乎還無法擺脫困境？儘管博物館人類學者與相關領域專家，已經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活化策略的推動，例如大館帶小館的計畫，已出現「文物回娘家」和「部落策展人」這些值得肯定的社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賦權行動。但這些例子仍是有限個案，而且往往單靠幾位策展人的熱情與理想堅持，未能讓賦權理念獲得持續性與長期性的制度保障。例如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的部落策展人，在聘約到期之後面臨失業問題，讓好不容易出現的能動性再度消逝，並導致之後的族群展示流於形式的模仿，陷入一種族群分類屬性的功能展示（馬田 2012：116-124）。的確，大部分博物館的族群展示，儘管獲得原民會、客委會或文建會或多或少的資源挹注，但都是臨時和短暫的文化救濟福利，因此仍然存在著既有的結構性問題。然而對這些現象的評估和診斷，若只是將問題根源歸於硬體、行銷、輔導等「資源匱乏」的因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2011），而忽略對策展文化形式的意識型態進行反省，那麼仍然無法解決專業主義地方化後繼續客體化的慣習問題。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未能解構認同政治所造成的思維侷限，以致於在經過多方後殖民與社區賦權的實驗之後，主流的族群展示，走的仍是回歸認同政治的保守路線。

問題解決的關鍵，因此是文化形式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在人類學放棄族群代言後，看似消解了人類學的權威，卻往往只是製造了另一種族群本位中心的權威，未能改變族群內部權力階序關係的根本問題。顯然，以主體身份為判準的族群展示，關注於「認同政治」，推進從單一國族到多元族群的轉型，並未導向文化民主中更實質性的「差異政治」的實現。為解決「展示主體」這一個充滿矛盾的弔詭理念，我們還需從根基上進行一次反省，而這顯然不只要檢視人類學知識社群在博物館場域的論述生產情形，還得要解析臺灣威權慣習所制約的社會條件與歷史遺留。

討論：族群展示作為規訓政治的一環

博物館的發展，在知識基礎上，不會只局限於人類學的參與，藝術研究、歷史學、動物學、地質學、植物學等論述生產者，都可為博物館提供學科知識與專業評論。過去威權時代博物館之所以特別需要人類學家，是因為這門學科能夠生產種族和民族知識，提供執政當局為有效統治人民而進行族群分類的治理技術，在博物館場域以科學主義姿態進行族群展示。但是，當人類學家放棄了族群代言的權威角色，而博物館仍然需要人類學，則是意味著當代博物館的發展不能沒有人類學特別強調的「差異精神」，尤其是在與人類學領域密切相關的族群博物館與族群展示的轉型中。因此，對於臺灣博物館場域中族群展示內涵的「差異」知識範式，有必要重新加以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群差異觀念的檢討：種族、國族、族群

人群差異觀念在博物館場域的實踐，深受歷史與政治的影響，不同時代政治權力的介入，讓博物館的族群展示，呈現不同的政治意義。大致看來，我們可依照「製造差異」、「彌平差異」、「承認差異」三種類型，來理解一個世紀以來臺灣博物館場域族群展示的操作原則。

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與日本殖民時代自然史和人類學密切相關（李子寧 1997；呂紹理 2005；陳偉智 2009）。當時的進化論知識範式，不僅影響第一批人類學者，諸如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人的探勘踏查事業，也影響他們的相關論述，並在實務操作中形構了臺灣現代的種族分類與展示原則（胡家瑜 1999）。例如，受到從英國人類學家 Edward Tylor 到日本坪井正五郎的典範影響，伊能嘉矩將人群區辨從清帝國的生蕃、熟蕃、漢人分類，以科學方法首度定出泰雅、鄒、布農、排灣、查利先（魯凱）、阿美、卑南、紅頭嶼等種族。又如尾琦秀真，接受自然史（博物學）知識範式，企圖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建立一套完整的臺灣博物學史觀與展示實踐（李子寧 2008）。之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將臺灣南島語族以種族分類的原則，定位成高砂族身份，並與朝鮮人、印尼人、臺灣人等種族身份，併置在人類進化史與大東亞區域分布的時空位置上（李威宜 2010）。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標本室的種群展示，因為首任人類學教授伊川子之藏在 1920 年代於哈佛取得學位，受到德國傳播論、Franz Boas 文化相對論、Alfred Kroeber 文化區等概念影響，成為土俗人種標本室設置的陳列原則（宮本延人 1998）。可以說，日本殖民時代各種族群展示原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當時人類學進化論與傳播論的階序模式影響，並在服從帝國統治所需的臣民教育與殖民主義的任務下，製造出一系列種族差異的展示圖像。

戰後臺灣納入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版圖，博物館場域轉而奉行一種多族群單一史觀的國族主義。從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轉型後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將戰前與臺灣人分殊的高砂族的展示，納入中國國族主義框架中，成為接受文明教化的山地同胞（李威宜 2005）。五零年代，考古學家李濟以殷商中原文明為中華民族起源，民族學家凌純聲、芮逸夫等以非漢人為邊疆地區民族，在博物館事業建構共和中國的民族想像，形式上仍然帶有二十世紀前半葉通行的自然史與傳播論之科學色彩。這使得凌純聲率領的助理和學生在偏鄉地區所蒐集的南島文物，成為當時中華民國人類學家唯一直接來自「邊疆」地區進行文化搶救而入館典藏的標本代表。冷戰威權時代臺灣博物館建設中的族群定位，被框架在一個國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同胞分類原則，以中心／邊疆的傳播論範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建構一套「中原文明、明清臺灣、史前山胞」三段式的展示模式，將異質社群的生命經驗給封閉化在中國時間的敘事框架當中（李威宜 2013）。一種新的族群觀念操作，被帶進博物館的展示策略中，一系列山地同胞與臺灣省民現代化的特展，以平等主義的說辭，建構中華民族的同一性，以彌平異質人群的現實差異，推動標準化的國民規訓。

到了威權後期，在去中央集權的大勢下，中心的概念出現了多元分化。博物館建設上，臺北不再是唯一的中心，高雄、臺中、臺南等都會也開始興建國家級博物館，形成了多個中心。隨著各類型博物館的建制，越來越多受過專業人類學訓練的學者直接進入博物館工作，主要集中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南科分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國家級的博物館機構，也有為數不少人投身地方博物館的工作。解嚴以後本土化的需求，臺灣社會開始強調多元身份，族群展示的意識型態，也因此從中國國族主義分化出臺灣國族主義，再分殊成族群／社群主義。但是，九零年代以來得到承認的族群差異，由於還未能充分正視族群內在混雜與相互衝突的現實處境，因此這種族群差異的保護與展示，仍然沿襲過去所製造的本質化的樣版象徵，只是在形式上強調多元分化的數量增生而已。

人類學的知識生產，常常透過民族學術語的界定來論述文化，可是民族的界定，卻又容易將文化特性客體化，透過再現原則的操作，為歸屬政治所支配。臺灣百年來人類學的發展，一直在種族、國族、族群等民族學的範疇中打轉。這就造成在臺灣博物館的實踐經驗上，對集體想像的建構，往往倚賴以民族學為核心的人類學菁英，生產民族識別的科學知識，展示族群分類的客觀表徵。形式上，隨著人類學知識範式的轉變，博物館的族群展示，已經從「製造差異」、「彌平差異」，轉變到「承認差異」。但實際中，後威權時代的操作並未改變威權慣習，同樣執著於族群分類的區辨，並繼續認為族群文化可以透過博物館的物件加以展示，其原則都是基於一種可以被再現的本質想像。然而，此種強加文化再現作為博物館任務的思維模式，卻是需要重新檢討的。

文化再現誤區的闡明

對於文化再現的追求，是 1980 年代新一代博物館人類學者王嵩山所追求的理想，[8] 他在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後，便積極思考如何將人類學的知識運用於博物館的建制與展示（王嵩山 1991），並對常民文化的博物館化多有用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民文化一旦進入博物館，成為值得保存於博物館中之重要事物（museum piece），其原本短暫、個別的生命，得到延長；更因其地域的性質，而可以發展成人類知識與物質成就的某一個特定的代表.....然而，常民文化終究是動態與變遷的.....「博物館化」之後的常民生活方式，有可能失去生命，成為文化中「式樣化」的表徵，再也見不著其繼續成長與發展的潛力。這樣的困境，使博物館的專業人員，更應思考如何透過展示與教育活動，呈現文化有生命力的精神及其生活方式的動態過程。」（王嵩山 1992：29-30）

王嵩山的觀點，可說是 1990 年代關於博物館族群展示論述的代表。一方面，他致力讓常民文化的代表物件進入博物館，塑造新的文化聲望，展現不同意義上的文化成就的象徵；另一方面，又希望透過博物館文物，企圖再現族群文化的動態過程。這當然與研究者所處的時局有關，那是物質文化重回人類學的時代，新成立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臺灣新一代人類學者提供了施展的空間。他勉力思考人類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田野調查等知識如何應用在博物館場域（王嵩山 1992），試圖在現代化理論範式下，透過博物館的族群展示，達成一種文化再現，不管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

王嵩山已經點出，常民生活方式的博物館化過程，有可能讓文化失去生命的問題。這就揭露出文化客體化的展示再現形式，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矛盾本質。近年來胡家瑜的論文（2007），更整體地針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展示系譜進行回顧分析，並就展示再現的知識、技術與權力關係進行反思：

「本文試圖以原住民展示再現的系譜做為分析主軸，討論五個時期的轉變—從早期模糊混雜的好奇觀異呈現、科學調查採集和系統分類展示、殖民統治和進化展示時期、人類學研究與族群分類展示、以及近年來多元展示管道和自我意識的發展...透過原住民展示的分析研究，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展示背後涉及的跨文化標本採集、知識觀點、再現技術、和社會權力關係；並且從另一個角度，檢視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的轉變歷程和發展方向。」（胡家瑜 2007：96）

比較關鍵的是，胡家瑜在結語已明確指出，原住民展示做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再現場域和社會產物，其中反射顯現的問題，可歸納為文化再現與文化賦權兩個層面，並指出長期以來展示再現場域的權力不平等現象，需要更多的討論和行動，她並以展示再現是多元且可爭論作為結語，表示沒有一種展示可以完整地再現文化全貌（胡家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7：113-114）。

儘管臺灣人類學者已經表明「族群展示不可全然再現文化」的看法，但是由於對文化再現在博物館場域作為意識型態的問題根源，還未能充分展開批判與討論，這使得文化再現的路線與操作原則，依舊支配著臺灣當前各類博物館族群展示的基本思維模式。再加上其運作考量總是受到內在與外在結構條件的制約，而不斷引發更多糾結問題。王嵩山前幾年曾比較客家文化園區與原住民文物館的發展，就已指出族群展示的不同建構樣貌：

> 「回應社會文化性質而產生的博物館樣貌存在明顯的異質性，臺灣的各個族群正以自己的方式詮釋博物館。客家博物館受制於技術官僚操控，雖有專業團隊規劃，終將選擇一種遊樂市場的想像的博物館。原住民族的博物館的建構則因尚未受到技術官僚影響，採取族群認同的建構模式，更加具體化臺灣文化的多樣性。」（王嵩山 2009：111）

王嵩山清楚點出在客家和原住民博物館建構中技術官僚的參與與否造成的差異。雖然他在文中並未講明相關的邏輯關係，但我們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這裡的「異質性」，是博物館族群展示客體機制中不同族群政治經濟地位的反映差別，而不是博物館建制接受不同展示典範的認識論差異。臺灣族群展示的癥結，仍然是建立在族群可以透過博物館物件被文化再現的展示邏輯之上。我們認為這一他者化的徵狀，有必要再進一步討論，才能解開這類文化形式實踐所再生產的意識型態。

當代博物館的論述已經針對原真性的問題進行深刻挑戰（Errington 1998），人類學的反省也已經提出想像優先於象徵的命題（Godelier 2007）。站在這些新典範的立場來看，族群展示作為文化再現的路線，必然陷入幾種「不可能」的誤區：既不可能透過展示客體來再現人群文化，也不可能透過展示形式達成人群追求主體的政治理念。回到人類學科放棄族群代言的初衷在挑戰族群展示「客體化」的問題，當我們接受這一目標，然接手的族群代理人卻未能適切轉譯當代人類學典範的認識精神，反而繼續將自己所代表的族群本質化，導致自我他者化的異化後果，人類學者就不能不對新代理者的意識型態展開批判。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文化再現」路線所追求的「認同」與文化民主化理念所追求的「差異」，兩者之間所形成的落差，甚至相互抵觸的問題，討論其矛盾根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一性與規訓政治：博物館史的批判

這一問題其實是與文化再現所依據的「同一性」預設以及與之共構互滲的規訓政治，密切相關。臺灣博物館迄今的人群展示，無論是依據哪種分類符號—種族、國族、族群—其認識論都是以「同一性」（identity）的再現為運作原則。這種操作非常類似於法國思想家 Foucault（1966）三種知識型（épistémès）區分中稱作古典時期的認知模式，強調分類秩序的再現（Représentation）和同一性／辨異性。[9] Foucault 這一知識型的劃分，常被當代西方博物館學界用來討論博物館知識生產，例如英國博物館學者 Hooper-Greenhill 指出，博物館人很少對博物館專業實踐的意識型態進行質疑，因此她透過 Foucault 知識型和有效史的觀點，反思博物館的實踐，進而打開一種批判式的博物館史的解讀（Hooper-Greenhill 1992）。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繼續討論臺灣後威權時代博物館族群展示的知識類型與意識型態的侷限。

在人類學放棄族群代言的權威後，臺灣人類學博物館的運作，其關鍵行動者，已由過去的執政當局和人類學者，轉由族群內部的菁英代理。這就讓很多人以為，後威權臺灣的族群展示，已能使用後殖民論述，並採取自我發聲姿態，由此相信他們已經取得主體位置的勝利。可是從族群「客體展示」轉到族群「主體展示」的追求，這一需要本身，就是一種充滿矛盾弔詭的異化，因為主體性的獲得，更多是發生在關係建立過程是否能夠形成一種互為主體的交流，而不是透過族群展示這類文化再現之客體化的固定操作。執著於族群主體可以被客體展示的迷思，是當代族群展示的第一種侷限。再者，目前族群展示的邏輯，其知識型的運用，依然受制於「同一性」的再現原則，迷戀在族群中心主義的史觀建構，很難轉換為 Foucault 的有效史觀。讓平滑史觀的意識型態繼續支配族群展示，不僅依舊輕忽族群主體真實存在所生的斷裂與矛盾之處，也同樣抹殺其中所現的曖昧混雜或縫合交流的能動之處，這是當代族群展示的另一種侷限。

明白了這些侷限，我們想進一步質問，為什麼賦予原本弱勢的被支配者一些行動權力，其還是未能充分把握民主權利的行使，反而會主動迎合過去的政治操作？要能解釋這些疑問，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對文化形式生產的意識型態慣習的分析，討論後威權時代的行動者，為何無法超越威權時代的歷史支配模式？

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我們可參考英國博物館史學者 Tony Bennett（1995）關於展覽規訓的論點。他以 Foucault（1966）規訓體制的觀念，將現代博物館機構的誕生，放在一種更廣義的「展覽叢結」（Exhibitionary complex）的現象來理解，從「展覽學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規訓」（藝術史、自然史、考古學與人類學等學科知識）與「展覽機器」（博物館、博覽會、百貨公司、商場等）的知識／權力關係運作的治理形式，說明展覽叢結與監獄系統是從舊帝國體制轉型到現代社會體制過程中同步出現的一體兩面。現代社會採用監獄系統蓋起全景敞視建築，對社會失序對象進行控制，然而矯正的運作需要來自他者的監視，監獄機構的規訓成本太高，Bennett 指出，於是出現了一種進入日常生活的自我監視的展覽體制（例如 1851 年英國在水晶宮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十九世紀後半大型博覽會），在展示叢結中，不只使城市可見可知，使舊時代的人看見現代，同時也要使現代市民被看見，透過展示叢結的文化技術，讓勞動工人的身體、中產階級的觀念，在現代時間與空間關係下進行自我調節。透過展覽叢結機制，使現代社會的監視政治，更加無所不在。

臺灣當代客家文化園區和原民館的運作，即是將豐富的客家人和原住民的形貌，以象徵文物的展示，規訓成一種傳統客家人或原住民的樣子。這是因為族群展示的意識型態，還是停留在威權時代的規訓政治，將族群想像投射在一個可以被象徵化的文化身份，而沒有認識到固著式的同一政治就是一種規訓手段，反而積極參與展覽叢結的運作機制，渴望讓族群成員在博物館凝視展示物件之後，能夠證成集體認同。這種將**傳統**強加在**現代**的自我監視，將混雜異質的族群歧異，集體規訓在同一性的文化再現，認同於一種被看的固定角色，是一條錯誤的道路，並與其追求主體的願望，背道而馳。

威權慣習的遺留：現代人與傳統人的不對稱規訓

關於展示規訓的政治操作，臺灣與西歐的發展有相同之處，但是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關鍵的差異，需要加以說明。西方社會的展覽叢結，是將人規訓成為「現代人」，但是臺灣族群展示的機制，卻是將人規訓成為「傳統人」的樣貌。究其成因，我們認為這是威權末期臺灣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過程中，國家機器刻意政治操作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兩種意識型態的歷史遺留。

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冷戰時代推行的一套「中原文明、明清臺灣、史前山胞」三段式的國族展示模式。當時這套傳統主義論述，看似架構完美均衡，也具體表現在國家、省級和縣市機構的展覽體制中，但實際博物館的資源投入，卻集中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中原文明展示。相反的，環繞在人類學與自然史觀的科學式的族群展示，在 1950 年代末期政治樣版建立之後就陷入式微狀態。與此同時，現代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作為時代文化活力所在，實際上卻已開始影響了臺灣包括展覽在內的各種文化藝術活動，例如活躍一時的美國新聞處之熱絡，與臺灣省立博物館之冷清，就形成了耐人尋味的鮮明對比。

隨著臺灣社會的變遷，傳統與現代的緊張，在博物館建設中更發生了急遽的轉變。到了蔣經國主政的威權時代末期，形勢所迫，原先以傳統主義為核心的中國國族主義，逐漸轉為現代主義在臺灣的國家建設，幾座大型的現代博物館的興建，就是例證。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五、六零年代發明的「中原文明、明清臺灣、史前山胞」的大傳統範式，被修正為在現代國家發展下進行地方民俗宗教保存的小傳統主義。

七〇年代臺灣民俗尋根熱潮與鄉土文學論戰，既是臺灣退出聯合國與保釣運動等政治巨變所形成回歸現實世代對社會政治改革要求的覺醒行動（蕭阿勤 2008），文化界對公共領域之社會想像產生衝突的集體緊張行動（吳介民 2004），也是臺灣社會在全面工業化時期，菁英尋求新舊生活重組，試圖保存地方記憶的現代行動；但是在國民黨文化主管部門推動下的「歷史記憶」活動，卻將博物館的發展引向宗教神聖場域之中。由寺廟主持遙祭海峽對岸祖廟的儀式，將地方生活史縮緊在大陸祖先認同的政治任務上，藉由祖先崇拜的文化形式，地方記憶被引向「兩岸源流」的意識型態。在軟威權政治控制下，六、七〇年代的小型博物館建設（李威宜 2009），不管是外省移民博物館，如川康渝文物館、陝西文物館，還是地方博物館，例如位在學甲慈濟宮內的臺南縣歷史文物館、臺南市立民族文物館，都是將複雜多變的地方過去與族群過去，用「帝國隱喻」（Feuchtwang1992）的操作方式，化約為歷史起源之神聖象徵，以此具體化為一種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文化再現與民族認同。

臺灣社會在國家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城鄉、工農與族群之間的豐富張力，在傳統主義的制約過程，是被簡化成了現代國家與傳統地方的二元結構（Lee 2007）。而這樣的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立下，知識範式與社會實踐的轉型自然無法徹底完成，都會（臺北美術館、臺中科博館、高雄美術館等）以外的鄉鎮地區，繼續被製作成「傳統地方」。不對稱的現代性，構成了博物館族群展示的一種新的人群分類的製造模式，「現代人」與「傳統人」的雙元規訓，成為一種新辯證形構而出的意識型態：在都會，是作為一種「現代主義」的博物館展示，是成為一種西化的、全球的、品味的、藝術的與科學的中產市民的規訓生活方式；在地方，是作為一種「傳統主義」的博物館展示，是鄉村的、族群的想像，不過卻是一種原鄉的、原真的、原初歷史的與神聖的身份認同的原始規訓。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一種未完成現代性之政治規訓，構成了後威權時代文化民主化的障礙。今日族群博物館與文化園區的建設，無疑是在複製傳統主義的封閉史觀，繼續製作「傳統」族群。無法跳離族群本質化的陷阱，也就只能陷溺於族群符號化的困境，輕易地被文化商品化的大潮捲走。

結論：博物館中「人／群」的新定位

在臺灣自威權時代向民主化轉變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博物館出現的族群熱現象及其隱憂，包括博物館的空洞化（蚊子館）與商品化（紀念品店）等困境。正如我們回顧所見，後威權時代臺灣人類學已出現諸多反省，從尊重土著觀點到發聲政治、社區賦權、文化權的支持等，論述與實踐將思維視野帶到了新的至高點，但是問題卻持續存在。人類學家放棄族群代言，或可消解科學本位權威，但事實上也製造了另一種族群本位威權。而「展示客體」到「展示主體」的轉換中所涉及的弔詭，顯然不能只靠人類學內部的知識生產，還得檢視臺灣威權慣習所制約的社會條件與歷史遺留。

因此我們展開了兩個層次的討論。

第一是**再現（代表）政治的批判。**後威權時代，博物館的制度形式，從單一客體展示到多元客體展示，儘管不無民主化趨向，卻只是從單一中心到多元中心的地方分權，更多反映的是代理者的權力階序。然而，代議的再現政治，並不是平權政治。這就意味著，後威權所推展的多元主義，只是在形式上「承認差異」，仍與過去種族主義的「製造差異」、國族主義的「彌平差異」一樣，都採取同一種透過文物進行族群展示，從而再現文化的認識形式。但是，文化再現的取徑是與文化民主化的原則相抵觸的，因為其依據的乃是「同一性」之預設知識類型。

由此討論轉入了第二個分析層次，即對**現代展覽體制作為一種規訓政治的批判**。臺灣各式博物館的族群熱，儘管已從展示客體轉向對展示主體的追求，但因為沿襲文化再現的原則，忽略了固著式的身份政治本身就是一種規訓手段，因此繼續讓參與者「主動」把自己客體化為一種被看的固定角色與身份認同。不過，與西方社會展覽叢結將人規訓為「現代人」的模式略有不同的是，臺灣族群展示在威權時代後期，因現代國家與傳統地方並存的二元模式，導致國家與大都會場域的人群規訓採取「現代人」樣貌，而地方和族群場域卻著力構建「傳統人」形制。這影響深刻的不對稱規訓，是後威權時代博物館文化民主化的一大障礙，博物館的族群熱既是其徵狀，也是其後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想要從族群展示客體轉到族群展示主體的追求，就是一種充滿矛盾弔詭的異化需要。畢竟一旦展示，就很容易發生單向度的客體化結果。可是主體性的獲得，更多是發生在關係建立的主體交流，而且必須是在適當場所、適當時機發生，才有可能產生主體生成的能動意義，而這不一定是在博物館場域就能發生。因此，博物館族群展示的重點，已不在於「文化再現」的目標，而在於提供我群主體對觀眾他者可以充分進行「文化表達」的開放性要求，以及提供觀眾他者藉由人群展示的媒介，能夠體會不同群體的存有世界，進而擁有一種「文化想像」的感受能力。

所以，既有的「族群展示」的意識型態，一種以認同為依歸的文化再現準則，需要被解構批判。但要如何超越依循代議政治與再現邏輯的侷限，解脫身份規訓的權力制約？如何化解文化民主化的阻力？這些問題是龐大而複雜的。在本文關注的博物館建設的脈絡下，從人類學的角度，我們想提出以下幾點粗淺的看法：

1. 解構規訓：多樣性公共表達的社會實踐

博物館建設中，認知（科學知識）和共存（社會實踐）的要求，是其關注人類生命活動的兩個基本切進方式，只是側重點不同：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是要建構一個客觀事實上的文化再現與推廣展示；而所謂社會實踐，則是意識到人的活動在根本上是多元的，是不同主體的互動過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在不斷重組。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場域，需要修正過去獨尊科學主義的運作路線，重新積極介入社會實踐路線，力求公正應對真實生活的多樣性（自然也包括分歧與衝突）。而一旦考量社會實踐的責任，就必然涉及文化資源不平等的社會轉型問題。所以，博物館的文物，就不再只有保存、展示與研究的歷史性，同時還具備特定時代的社會性。承認博物館作為一個權利場域，而不是一個權力鬥爭場域，它在後威權時代的議程，就需要挑戰舊有階序規範，積極介入民主理念的社會實踐，重組一種平等的權力關係，而這可以包涵兩層意義：

第一層意義是，**文化資源不平等的社會轉型**：博物館中的族群定位，必須揭示社群內部文化實踐不公的隱形狀態。而這一現象，在臺灣跟在全世界別處一樣，還必須還原到每個社會類型的公與私、平等與自由的現實緊張關係，更細緻的澄清與討論。例如對博物館族群藝術展示所產生的族群消費、認同封閉、階級分歧等政治操作與商品異化等問題展開論爭；將博物館的空間，視為人類學與藝術學的爭議場域（Marcus and Myers1995），把文化生活與藝術品位中隱晦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公開展示；將人類學研究所帶入的議題、關懷的角度、爭議的分析、觸及的面向本身，作為文化資源，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在博物館的場域，加以發掘、運用與佈署。唯有啟動一個文化正義空間創建的實踐議程，力求化解更廣大範圍內扭曲壓抑的權力政治，介入文化民主化的社會轉型工作，才是族群議題在當代博物館場域被允許使用的公共目的。

更深層的意義是，**多樣性公共表達的捍衛：**公共性的社會實踐，除了政經不平等的考量之外，更需要細緻考量「表達形式」的不平等。這是因為博物館的建設，已不再是族群固著化的**文化再現**與身份規訓，而是要維護**文化表達**的開放性與創生性的制度條件。這正是人類學投入博物館作為公共場域的運作，與其他學科的不同之處。這也是世界文化遺產體制，在全球各地人類學者的倡議下，從民俗文物的客體保存轉向無形遺產的文化空間與文化表達的價值所在（Akiawa-Faure 2009）。而我們相信，所謂人類學的精神，就是特別強調文化表達的多樣性，凸顯其主體行動的意義，例如透過語言論述（理性的、情緒的、敘事的、神話的、無聲的…）、物件展示（科學的、宗教的、情感的、…）、戲劇展演（藝術的、儀式的、神聖的…）、各種感官形式（視覺、視覺、聽覺、觸覺…）等。博物館族群展示的當前任務與未來議程，就是要適切地解構「主流表達形式」以語言論述和視覺凝視那種統攝性、同質化與支配性的權力結構，創造一個讓異質人群都能有機會以其主體位置能「自在文化表達」的開放場域。唯有捍衛公共表達的多樣性條件，這樣博物館作為公共性的文化平臺，才有可能豐富起來，並真實體現文化正義的理念。

2. 超越再現：重新定義「人／群」

然而，要能打開多樣性的理解，我們認為，還必須重新定義「族群」觀念。「承認差異」只是後威權時代去霸權中心的開始，要能在博物館建設中實踐文化民主化的理念，我們面臨著一種從根本上的轉變要求：超越以種族／民族／國族／族群邊界劃定的「規訓性認同」思維模式。這就意味著博物館中的族群定位，不該是文化再現的工具，而應是異質經驗的多方考量，這包括幾種新的認識形式：

第一種認識形式是，**異質人群的再定義**：族群差異觀念的檢討，不應再侷限於種族、國族、族群等規訓觀念，而應擴展到「住民」與「移民」等因人類定居與遷徙等活動形態產生的人群集合，避免新的社會排除。[10]

第二種認識形式是，**考量「個體」與「群體」的關聯**：要跨越種族、國族、族群認識的侷限，博物館呼喚的人／群，就不只是社群的再現、認同與規訓，還要關注每個個體與多重群體之間的複雜關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整體的認識形式是，**關注「人類群體」與「非人類群體」的再連結**：博物館對生命群體差異的理解與對「共存」理想的實踐，在我們今天已經走到必須破除人類中心主義的時刻。「群」的概念，需要還原到生態學意義的物種群組上（各種動物群、植物群）。因此，博物館對於「人／群」（Human/Population）的關注，必須深刻反省它與其他非人群組的聯繫。這其實意味著要全面更新十九世紀博物館自然史時代涵蓋的可能性，並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人群誤解、物種危機與生態問題，嘗試開發新的轉譯模式。

3. 異質共生：差異交流的關係性

「人／群」在博物館的重新定位，目的是要呼應真實生活的多樣性。然而，看似多樣豐富的差異並列，也可能只會造成更深刻的區隔，阻礙「共存」生活的公共性。如何超越不同人群「存有之真的多樣性」（避免各自為陣）與「民主生活的公共性」（避免消除異己）的兩難？

透過族群展示的文化再現來達成所謂「主體」的展示是虛妄的，而且成就族群身份認同與文化聲望，也不是人群博物館的責任。我們認為，後威權時代博物館「人／群」定位的正當性，既不是科學知識的客觀再現，也不是社會實踐中主體存有的確認，而是作為不同存有之真之間的「差異交流」。博物館的價值在於「關係性」的條件維繫。博物館應該面對的，是當代人類社會根基已然變遷的處境，需要承擔流動人群異質生活交流的信託責任。如何在博物館場域創造一個能夠對他者的存有之真，進行實質面對面的「我與你」的關係建立，提供認識、體驗、感覺的別種可能？如何建立一種異質共生的聯繫，創造一個能夠沈浸於別人的想像世界的機會？這是當代召喚人類學者投入「人／群」展示工作的理念所在。

而這些體驗要能在博物館實踐中成為可能，一種必需的條件，是人類學式的田野觀念與政治實踐（Gupta and Ferguson 1997）。我們認為，當代博物館人若能具有人類學田野調查所建立的關係為認知基礎，具備一種進入浸淫與離開超然的往返體驗，就有能力在人類活動與博物館之間構織新的創生互動：一則可以是，思索如何以人類學擅長的**文化轉譯**，將現實他者在日常生活中，例如被遮蔽與誤解的文化挪用的多樣性（Schneider 2006），轉成博物館場域公開的、有感的、多知覺表達形式的豐富性；二則可以是，面對增生繁衍的異質經驗，以人類學長期以來建立的知識資料庫，妥善而彈性地轉化為博物館中的文化資源，提供不同參與者各種適才適性的人類參照系，用以創造觀者與參與者，一種具有歷史深度與空間廣度的**文化想像**，將博物館建設為一種獨特時空交流的文化想像的詮釋空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一切的關鍵在於，要使博物館成為民主社會中各種異質人群建立「關係性」聯繫的文化制度條件，讓「交流」成為文化創造的發生點，實踐一種「異質共生」的人文博物館。

附　註

1. 例如 2003「藍天紅土：北美西南印地安文化特展」、2003「失落的史前惠來人：重現科博館特展」、2004「穿越時空訪臺中：古早臺中人的故事」、2008「古早臺中人的故事 II」、2008「大洋之舟特展」、2008「穿在身上的史詩：苗族服飾特展」、2009「祖靈的居所：臺灣排灣族古陶壺特展」、2010「海角印象：劉其偉父子的新幾內亞特展」、2011「山海船情：臺灣原住民造舟文化與植物利用特展」、2011「西拉雅：歷史與當代的連結」、2011「太陽之子：當神話傳說遇上排灣族」、2012「三八女能手：施洞苗族服飾的兩個異想世界特展」等。

2. 例如 2009「采田福地：臺博館藏平埔傳奇」、2009「太陽之子：當神話傳說遇上排灣族」、2011「勇者再現：賽德克·巴萊典藏展」、2012「獅子鄉大龜古文物返鄉特展」等。

3. 例如 2002「馬雅 MAYA—叢林之謎」、2003「印度古文明藝術特展」、2003「前進非洲：原始藝術特展」、2004「古剛果文明展」等。

4. 例如 2011「聞眾之聲：霧社事件 80 周年特展」、2013「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2013「落地成家：臺灣眷村特展」等。

5. 在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的前身）的贊助下，多個以客家為名的地方博物館相繼開幕：1998 年高雄市客家文物館、2001 年高雄縣美濃客家文物館，以及屏東的六堆客家博物館。隨著客家事務委員會的成立，又先後啟動了五個客家文化園區的成立計畫：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臺北縣三峽客家文化園區、臺東縣客家文化園區、臺中縣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苗栗縣銅鑼客家文化園區等等。

6.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室在 1990 年代之前，僅有兩次配合時代政治意義的公開展出，分別是 1934 年「臺北帝國大學開學紀念展覽」和 1948 年配合首屆臺灣省博覽會而舉辦的「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展覽」（胡家瑜 1996）。

7. 包括 1995 年到 2001 年間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陸續與卑南族、鄒族、阿美族、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雅族、排灣族、布農族、賽夏族社區團體合作策展的個案，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1998 年由排灣族藝術工作者策展個案，以及 2002 年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於開館後所舉辦的「照片會說話—三個鏡頭下的臺灣原住民」特展，宣稱以「後殖民觀點」呈現三種攝影機不同觀看視角的個案（許功明 2004）。

8. 王嵩山，臺大人類學所畢業不久就投入甫成立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服務（1988 年），先後擔任人類學組民族學門負責人（1997-2006）、展示組主任（2004-2005）等工作。2000 年代初期開始投入知識生產的社群組織動員工作，包括期刊專題的規劃，以及舉辦一系列博物館研究學術研討會，集結出版論文集。2005 年籌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擔任所長，之後再主持該校文化資源學院的領導工作。是臺灣近二十年來博物館人類學實踐的代表人物。

9. Foucault 在《詞與物》（1966）乙書中提出知識型的觀念，並區分文藝復興晚期、古典、現代三種類型。文藝復興知識型主要根據相似和類似彼此間的隱藏關係建構博物知識；古典時期知識型，則強調分類之後的再現（Représentation）和同一性與辨異性，建立分類秩序；現代時期知識類型，強調生活觀念與人的科學。

10. 關於社會排除的問題，可參考 Newman and McLean（1998）。

引用書目

王嵩山

1991 《過去的未來》。臺北：稻鄉。

1992 《文化傳譯：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臺北：稻鄉。

2009 〈族群與想像的博物館：臺灣原住民族與客家的比較研究〉。刊於《製作博物館》。王嵩山主編，頁 97-114。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2009 《辦理 98 年度地方原住民文物館活化計畫總成果報告書》。屏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2011 《辦理 100 年度地方原住民文物館活化計畫總成果報告書》。屏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子寧

1997 〈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241-273。

2005 〈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百年來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刊於《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 3-36。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8 〈標本物語：收藏者與其藏品的故事〉。刊於《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李子寧主編，頁 16-51。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9 〈再訪 Contact Zone：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臺博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人類學與人群的遷徙與重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慶祝成立 60 週年國際會議」宣讀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11 月 13-14 日。

李威宜

2005 〈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刊於《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 367-390。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9 〈博物館想像的社會史研究：1960-1980 臺灣小型博物館製作者與展示物的視覺想像與歷史敘事〉。刊於《製作博物館》。王嵩山主編，頁 59-96。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10 〈蒐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政治與科學的權力運作〉。刊於《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王嵩山編，頁 49-68。臺北：國立臺灣科學博物館。

2013 〈在中國時間中的博物館文物〉。刊於《學術探險：臺灣百年博物館誌》。陳國偉、黃淑芳主編，頁 92-107。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李莎莉主編

2007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物）館營運行銷手冊十大關鍵秘笈》。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吳介民

2004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行塑與衝突〉。刊於《公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李丁讚編，頁 299-355。臺北：桂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呂理政

1988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呂紹理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

林頌恩

2011 〈是意義還是義氣？：以史前館為例談博物館與部落合作展示詮釋背後的江湖之道〉。刊於《博物館展示的景觀》。王嵩山主編，頁 353-377。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胡台麗

2003 《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出版社。

2012a 〈我為什麼要攝製「讓靈魂回家」紀錄片？〉。「讓靈魂回家 Returning Souls」，http://returningsouls.pixnet.net/blog，2012 年 2 月 20 日上線。

2012b 《讓靈魂回家》。85 分鐘，DVD。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協同製作。

胡家瑜

1996 〈從民族學研究到異文化展示—由臺大人類學系「原住民物質文化」特展談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2：148-171。

1999 〈伊能嘉矩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與物質文化收藏〉。刊於《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胡家瑜、崔伊蘭主編，頁 37-7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7 〈博物館、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型變化〉。《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94-124。DOI: 10.6152/jaa.2006.12.0006。

姚瑞中

2011 《海市蜃樓 II：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臺北：田園城市。

馬田

2012 《部落策展人的地方館省思：以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為例》。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宮本延人

1998《我的臺灣紀行：宮本延人口述》。連照美、宋文薰譯。臺北：南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安倍明義、田中薰、大島正滿、鹿野忠雄、宮本延人、田中剛、淺井惠倫、國分直一、金關丈夫原著；楊南郡譯著

2005 《臺灣百年曙光：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臺北：南天。

許功明

1997 〈原住民觀眾對科博館臺灣南島民族展示看法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2：99-128。

1998 《博物館與原住民》。臺北：南天。

2004 《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臺北：南天。

陳偉智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1-35。

廖珮珊

2011 《移動的人與物：大館帶小館「文物回娘家」特展網絡的權力關係》。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臧振華

2005 〈社區作伙：史前館的「藍海策略」〉。刊於《博物館，社區與文化多樣性：2005 年博物館館長論壇》。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頁 102-119。臺北：國立歷史博館。

蕭阿勤

2008 《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Akiawa-Faure, Noriko

2009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Pp. 13-44.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Clifford, James

1988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ias, Nélia

2001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Teaching Ethnographic Museology in Portugal Thirty Years Later. *In* Academic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Back to the Future. Mary Bouquet, ed. Pp. 92-104.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Errington, Shelly

1998 The Death of Authentic Primitive Art and Other Tales of Prog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uchtwang, Stephan

1992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oucault, Michael

1966 Les Mot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Godelier, Maurice

2007 Au fondement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Ce que nous apprend l'anthropologi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Pp.1-4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oper-Greenhill, Eilean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Jones, Anna Laura

1993 Exploding Canon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201-220. DOI: 10.1146/annurev.an.22.100193.001221.

Kaplan, Flora Edouwaye S.

1996 Museum Anthrop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 Pp. 813-817.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Lee, Wei-i

2007 Cent ans de musées à Taïwan. Du colonialisme au nationalisme, vers un imaginaire au-delà de l'identité ? Transcontinentales 4: 145-167.

Marcus, George E., and Fred R. Myers, eds.

1995 The Traffic in Culture: Refiguring Art and Anthr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man, Andrew, and Fiona McLean

1998 Heritage Builds Commu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Ex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4(3-4): 143-153. DOI: 10.1080/13527259808722232.

Ortner, Sherry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 126-166. DOI: 10.1017/S0010417500010811.

Schneider, Arnd

2006 Appropriations. *In* Contemporary Art and Anthropology. Arnd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Wright, eds. Pp.29-51. New York: Ber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elton, Anthony Alan

2006 Museums and Anthropologies: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 *In*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Sharon Macdonald, ed. Pp.64-80. Oxford: Blackwe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